
鄧小平復出後的中共政治情勢

姚孟軒

七月十六至二十一日，中共在北平舉行十屆三中全會。二十二日由新華社發佈的會議公報說，這次會議一共通過下四項決議：(一)追認華國鋒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並認可以華為接班人，是根據毛澤東生前的安排，也就是確認華國鋒的合法繼承地位。(二)恢復鄧小平被罷黜前的所有職務，包括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還包括共軍總參謀長。(三)永遠開除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的黨籍，撤銷他們黨內外一切職務。(四)在今年適當的時候「召開黨的第十一次大會，並決定「十一大」的議程為政治報告、修改黨章，改造黨的中央委員會。

三中全會這四項決議，對當前一系列重大政治問題，有三個作了處理，兩個擬定時間表，留給「十一大」解決。留給「十一大」的政策路線和權力分配問題，這裏暫不討論，先就已處理的三個問題作一分析。對埋葬江青等「四人幫」的政治生命，北平新黨權派早已獲致協議，為判處政治死刑搜羅的各種罪狀，也在三個月前已有定案，並公諸於世^①。但華國鋒既得權位的合法化與鄧小平的復出，這兩件事都拖了很久；尤其是鄧小平問題，更在中共高階層激烈軒然大波，成為江青事件後權力鬥爭的新焦點。表面看來，三中全會為解決這兩個棘手問題所作安排，好像是華、鄧妥協的結果，即是華國鋒准許鄧小平官復原職，鄧小平承認華國鋒的領袖地位，雙方各取所需，權力的欲望都得到滿足。不過，這種推斷不完全符合事實。

先就整個事件的演變經過觀察。從十月政變到三中全會，這短短九個多月期間，華國鋒對鄧小平問題的態度變了四次。在一九七六年十月，華奪權成功後的最初決定，是持續推展批鄧反右，不僅要堵死所有出路，阻止鄧小平及其一系的人物乘機再起，而且還要繼續批鬥他們^②。兩個多月以後，變至停止批鄧反右運動^③，承認這個運動犯過無限擴大打擊面、株連過眾的錯誤，但將責任

註① 「新老反革命組織的黑幫」——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北平兩報一刊聯合評論。

註② 吳德在北平羣衆大會的講話——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北平人民日報；並參閱拙作「從江青事件看中共變局」——「匪情月報」第十九卷第七期。

註③ 華國鋒：「在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北平人民日報。

完全諉諸「四人幫」，並仍然肯定對鄧的罷官處分是對的，不准替鄧翻案^④。一九七七年三月，又變至親自出面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替鄧開脫掉天安門事件的罪狀，說他是受了「四人幫」的「誣陷」；還說鄧在主持「國務院」工作期間，有成績也有錯誤，要批評他的錯誤，也要給他重新工作的機會^⑤。這就打開封閉的出路，決定放鄧出來。然而，華國鋒只說讓鄧「出來工作」，沒有說要恢復他的一切職務；而認定鄧犯有必須批評糾正的錯誤，也只是把鄧小平問題的性質，由原判決的「敵我矛盾」^⑥，改判為「人民內部矛盾」。到七月三中全會，再由出來工作變至官復原職；三中全會公報及其他有關文件，對鄧的錯誤一字不提，反強調毛澤東對他「早有過明確的全面的評價」^⑦，這是由「人民內部矛盾」再變至沒有矛盾。於是，鄧小平得到全面平反，並以「久經考驗的領導人之一」^⑧，重返北平政治舞台。

華國鋒一再出爾反爾，節節退讓，最後退到完全背離原來的立場，雖然換得繼承權位的合法保障，以及鄧小平支持其領導地位的承諾^⑨，但是，就後一所得觀察，在中共權力鬥爭歷史上，失勢的一方慣常使用這種妥協手法，以退為進；鄧小平在前一次被整肅後，就向毛澤東寫過悔過書，保證永不翻案^⑩，而一旦恢復權勢，却又背棄諾言，仍舊同毛及其親信的文革派為敵。華國鋒靠政治投機發跡，也曾用同樣手法對付過江青，自當了解鄧小平的保證不足信賴，他所得到的只是一張不兌現的空頭支票。繼承權位的合法化確實是華的一項收益，惟在共產制度下，權力的得失主要是取決於實力的強弱，不是取決於有無合法保障。「憲法」保不住「國家主席」劉少奇、黨章保不住法定接班人林彪，這兩個事例，已證明法律保障的不足依恃。尤以對缺乏實力基礎的華國鋒而言，鄧小平是個勁敵；以放出這個可能吃掉他的矮腳虎，換取兩項不足信賴和依恃的保障，這筆政治交易實在是得不償失。

華接受這筆蝕本生意，顯係遭受強大壓力，而非出自本心；他的節節退讓，也即是在壓力之下討價還價，希望把損失減少一些。一九七七年一月，北平爆發要求「解放鄧小平的風潮」；二月，又有華南擁鄧派與北平反鄧派劇烈爭鬥，形成「南北對峙」的傳說^⑪，由而逼出三月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的決議，華國鋒由阻鄧復出變到讓鄧復出，退了關鍵性的一步。但三月會議後，華仍在運用拖

註④ 批鄧反右運動自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已經停頓，中共傳達工具最後一次提出批鄧者為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江蘇電台廣播。

註⑤ 中共三中全會會議公報——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北平人民日報，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講話的內容，係引據台北有關方面得自中共人員的祕密資料。

註⑥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罷黜鄧小平的決議，指鄧的問題屬於敵我矛盾。

註⑦ 「歷史性的會議」——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北平兩報一刊聯合社論。

註⑧ 此語引自中共省級電台慶祝中共十屆三中全會的新聞廣播及評論，十幾個省市均以這句話評價鄧小平。

註⑨ 據台北有關方面所獲消息，鄧小平一九七六年四月十日致華國鋒、葉劍英及中共中央函件，中共曾以「中發字十五號」文件向全黨傳達，鄧在信中保證支持華國鋒。

註⑩ 「為什麼走資派還在走？」——中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播。

註⑪ 「鄧小平同志還不能復出的阻力」——廣州醫學院醫療系一九七七年四月十七日大字報。

延戰術，企圖將釋放鄧小平的時間盡量推遲^⑫。五月，北平首次使用「四人幫一類」的字眼，指控隱藏在黨內的野心家，拉幫結派，自成系統，大搞獨立王國^⑬，使中共面臨分裂危機。就在這緊要關頭，華國鋒再度退讓，這才有三中全會的召開。由此不難看出，圍繞鄧小平復出問題，擁鄧派與反鄧派有過一番激烈搏鬥，來自擁鄧派的壓力很大。然而，如果認為中共黨內只有擁鄧、反鄧兩個派系，華的退却，乃是屈服擁鄧派的壓力，也欠允當。事實上，除了擁鄧派和反鄧派，還有個很具影響力的第三勢力，華國鋒的讓步主要是這股第三勢力所促成。

毛澤東在文革初期就將中共劃分為左、中、右三派^⑭，他的權力結構，是以左派為主體，容納一些中間派和可以容忍的穩健的右派。在死了毛澤東、整掉「四人幫」以後，華國鋒承襲這個舊班底，但優勢已由左派轉向其他兩派。接着這兩派又在如何對待文化革命，及處理鄧小平問題上發生分化^⑮，並形成以葉劍英、李先念為代表的新中間勢力。他們肯定鄧犯了錯誤，毛對他的革職處分是對的；而另一方面，又肯定鄧是個「好指揮員」，應該讓他「恢復工作」^⑯。對於華國鋒，他們也曾一再表示擁戴^⑰。在三中全會結束十天後，葉劍英更明白宣佈，選擇華為領袖，是爲了保持「黨和國家最高領導和長期穩定性」^⑱。這是公開向華國鋒提出保證，他們仍將「長期」支持華的領袖地位，不會因鄧的復出有所改變；這也是間接對鄧小平發出警告，他們雖然支持鄧官復原職，但鄧已經老了，不適用擔當大任，不能再謀奪最高領導權力。有了葉劍英的担保和支持，華國鋒的讓步已得到相當豐厚的補償；而鄧小平也得以恢復已喪失的權位。當擁鄧、反鄧兩派愈鬥愈烈，形成尖銳對峙局面，中間派站出來承擔責任，就以這種折衷方案，在三中全會達成使雙方都能够接受的決議。

七月二十二日，北平報刊引用列寧的話，說明三中全會的決定，旨在以華國鋒為領袖，與葉劍英、鄧小平及其他中央領導人「同心協力」，建立「比較穩定」的領導中心^⑲。這已道出葉劍英等中間派的意向，確想經由這番安排，謀求長期妥協，化亂為治。

註⑫ 三月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就鄧小平復出問題達成協議，四月十日鄧致函華國鋒，五月三日始作傳達，七月十六日才舉行三中會。

註⑬ 中共遼寧省委理論組：「從高饒反黨聯盟到『四人幫』」——北平紅旗雜誌一九七七年第五期。

註⑭ 引自郭華倫：「中共領導權鬥爭的可能結果」——匪情月報第十九卷第十二期。

註⑮ 參閱拙作「當前中共內部情勢的分析」匪情月報第二卷第一期。

註⑯ 李先念與倫敦星期泰晤士報主編丹尼斯·漢米爾的——一九七七年四月二日香港大公報。

註⑰ 葉劍英、李先念「全國在工業學大慶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七七年五月十日人民日報。

註⑱ 葉劍英在中共建軍五十周年紀念會大會上的講話——一九七七年八月一日人民日報。

註⑲ 同註⑦。

不過，他們的願望是否能夠實現，仍在未定之天。

如上所述，三中全會能就解決華、鄧之爭達成協議，是依靠中間派的制衡力量。而這一派中有影響力的重要人物，都到了垂暮之年，他們的主帥葉劍英，更是老邁多病，無法經常過問黨政軍重要事務，所能發揮的制衡作用畢竟有限。華國鋒工於心計，爲了保權，也許有意在維持現狀前提下，與鄧小平妥協。但妥協也要有實力，華面對強敵，必將致力培植自己的權力基礎，逐漸減少對葉劍英等老人幫的依賴。其次，據七月抄北平大字報透露，華國鋒幫的三員大將陳錫聯、汪東興、吳德，對傳達及宣傳三中全會的決議採消極抵制行動，汪東興並告訴所屬「統一」是暫時的，鬥爭會不斷出現^②。足見這些人對鄧小平東山再起滿懷怨憤，還想伺機報復。另一方面，鄧小平已七十四歲，來日無多，就常理推測，應該以大局爲重，不再熱衷於名利的角逐。可是，鄧是中共出名的倔強人物，驕傲跋扈，對險些斷送掉他政治前程的華國鋒^③，更積恨已深，不會忘懷。鄧在三中全會講話，自稱「老革命」，說以華爲接班人，「是老一輩革命家所信任的，完全放心讓他當家」^④。儼然以前輩自居、家長授權自命，「完全」沒有把華國鋒放在眼裏。這樣的人，實在看不出他會突破名利關，就此止步。事實上，復職前後，他的親信萬里，已取代被打成「四人幫」一夥的宋佩璋，奪得安徽黨政大權；其另一親信胡耀邦，在北平八一建軍節集會上亮相，且排名在中共中央各部會首長之前，顯然已取得重要職位。而鄧本人連總參謀長這一應由職業軍人擔任的次要職務都不肯放手^⑤，顯示他也在覬覦軍權。華、鄧兩派的心理隔閡既難消除，雙方又各有各的打算，實難指望他們能同心協力。兩派目前羽翼未豐，對中間派的干預也有顧忌，或許不致很快爆發大火併，惟雙方必將競相擴張權勢，從北平到地方，在黨政軍各方面展開爭奪，也可能有火爆場面。因之，對華、鄧兩派而言，三中全會不是妥協，而是第一回合鬥爭的結束，也是第二回合鬥爭的開始。

鄧小平雖已贏得第一回合的勝利，并在老幹部與軍中擁有相當號召力，有力量同華國鋒一較短長，但將「二野」系統的老人，甚至將會被整鬥的黨政軍老幹部統統歸屬於鄧派，則是對鄧的實力估計過高。事實上，「二野」中頗具影響力的陳錫聯，就是反鄧的健將；而強大中間勢力的出現，也反映很多黨政軍老幹部僅支持鄧復出，並不支持他奪權。再看地方對鄧復職的表態，至今只發現新疆、青海兩地，對鄧刻意吹捧^⑥，其他省市僅復述北平頒發的詞句，反應不算熱烈，鄧顯未得到地方勢力的廣泛擁護。在第一

註① 「從三中全會看幾個值得深省的問題」——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北平清華大學署名「清華指點江山」大字報。

註② 據台北有關方面所獲消息，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華國鋒曾以代總理身份，伙同江青、姚文元、倪志福等在北平參加批鄧集團，在會上講話列舉鄧結黨營私、歪曲毛指示、竄改基本路線等二十項罪名，並斷言鄧必定「頭破血流、身敗名裂」。

註③ 鄧小平在三中全會的講話，未公開發表，引自台北有關方面所護鄧講話要點。

註④ 共軍總參謀長向由職業軍人擔任，「四屆人大」時因防制江青等謀奪軍權，始由鄧小平兼代，現江青等已遭整肅，鄧按理不應再兼此項職務。

註⑤ 七月二十三日新疆電台廣播、七月三十日青海電台廣播。

回合中遭受挫折的華國鋒，則因獲得葉劍英等中間派的保證及支持，爭取得強有力的同盟軍，使反江奪權的聯合陣線，鞏固並升級為鄧保權的聯合陣線；而有了合法的領導地位，對招兵聚將也大有助益。由此觀察，華、鄧兩派現在是勢均力敵，一時還難分高低，認為鄧派已佔壓倒優勢，甚至說中共已進入「鄧小平時代」^②，都缺乏根據。目前可以預測的只是：繼三中全會而來的「十一大」和「五屆人大」，將重新進行權力分配，此為雙方所必爭；第二回合爭奪戰的勝負，要看那一派能在十一屆中央政治局取得優勢地位，主要是看那一派能佔據「國務院總理」的寶座。文革以來由於黨權式微，政權的地位大大提高，故「總理」職位的得失，對權力消長有重大影響。

走筆至此，中共「十一大」在北平開了八天^③，已於八月十八日落幕，接着舉行的十一屆一中全會，選出主席華國鋒，四個副主席是葉劍英、鄧小平連任，新增加李先念、汪東興；又選出由二十三名委員、三名候補委員組成的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會五個委員，則由主席及四名副主席兼任。新政治局的二十六個成員有十個是新人，依據歷史背景及其從文革至今的政治動態推測，這十名新人中，有三個可能是中間派^④；三個可能是鄧小平派（其中一個是候補委員），一個可能接近鄧派^⑤；一個可能屬於或接近華國鋒派^⑥；另有兩個尚難確定^⑦。連同留任的成員一併計算，中間派可能由三人增至六人^⑧，鄧派可能由四人增至七或八人^⑨，實力有顯著增強；華派可能仍是八或十人^⑩，數量上沒有增減，但汪東興當上副主席，倪志福和接近該派的蘇振華^⑪，由候補委員升為委員，其發言地位也較前加強。由主席及四個副主席組成的政治局常委會，是兩個中間派，兩個華派，一個鄧派，鄧看來好像勢單力孤，惟「十一大」由華作政治報告，葉作修改黨章報告，鄧致閉幕詞，顯示新的領導核心名義上是五人幫，實質上是個三人幫，鄧小平並未吃虧。

由此可知，「十一大」建立的新領導體制，不是華國鋒體制，也不是鄧小平體制，而是在中間派強力牽制下，把敵對的華、鄧兩派拉在一起，併湊而成的集體領導體制。三股力量大致已被擺平，不過，這是用提高鄧派與中間派、壓抑華派所獲致；而鄧小平

註② 「十一大」正式會議七天，八天係連預備會議計算。

註③ 三個中間派係聶榮臻、徐向前、烏蘭夫。

註④ 方毅、余秋里、陳慕華，陳為候補委員可能與鄧接近者為耿飈。

註⑤ 彭沖。

註⑥ 張廷發、趙紫揚。

註⑦ 除註⑥所列三人外，另三人為葉劍英、李先念、劉伯承。

註⑧ 除註⑦四人外，尚有鄧小平、許世友、韋國清、賽福鼎。

註⑨ 華國鋒、汪東興、吳德、陳錫聯、紀登奎、李德生、倪志福、彭沖、蘇振華。十屆政治局候補委員吳桂賢也屬於該派，此次僅入選中委，未能進入政治局。

註⑩ 蘇振華於十月政變後被派往「四人幫」的大本營上海，主持黨政工作，負責解決此一棘手問題，深得華國鋒器重及信任，故可能屬該派或接近該派。

這股力量的擴張，也加重對華國鋒的威脅。葉劍英爲此再次提出保證說：華可以領導中共「跨進二十一世紀」，今後如果有人「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權」，就在華領導下襲用文化革命的辦法，把他們的命革掉^{⑤4}。這也是更露骨的警告鄧小平，不許他輕舉妄動。在短短兩週內，葉劍英竟兩度對鄧發出警告，而且一次比一次嚴厲，葉這樣做，即使不是發覺鄧有異動的跡象，也是對鄧很不放心。不難看出，這種由一股力量牽連另外兩股力量的權力平衡，是建造在脆弱的基礎之上，一開始就顯得很不穩定。

華國鋒在「十一大」宣佈，中共已決定在「適當的時候」召開「五屆人大」^{⑤5}。「五屆人大」的一項重要任務，當是繼黨之後，解決政權的權力分配問題。中共在三中全會結束二十天後就舉行「十一大」，照這種速度推算，「五屆人大」的會期應該很近，至遲也應在今年年內，惟華國鋒提示的時間表，仍保留很大彈性，這可能因爲很多準備工作，也包括權力分配在內，現在還難確定何時才能完成。然而，不管「五屆人大」在什麼時候召開，政權方面的權力結構，必將採取黨的模式，在三大勢力間保持均衡，不會突出任何一派。儘管如此，「國務院總理」依然是當前權力角逐的主要目標。對北平政權新「總理」人選的估測，「十一大」必已可減縮到新領導核心的五名首腦人物；假若再剔除可能性較小的葉劍英、汪東興^{⑤6}，就只有華國鋒、鄧小平和李先念。鄧小平的政治行情正在看漲，但由華國鋒繼續兼任，或是由李先念組閣以爲緩衝，也不是全無可能。這三個人代表三個不同派系，他們何人入選，以及整個政權的領導人事如何安排，對測量北平的政治風向，將可提供較爲完整的資料。

三

鄧小平的復出，在政治上對中共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因之，觀察當前政治情勢，不能只看華、鄧兩派在高階層的權力衝突。除此而外，還有幾個因素，對中共的分合與治亂，也有重大關連。

三中全會公報指示將揭發批判「四人幫」的運動進行到底，北平報刊又作政策性提示說：要做好組織清查，徹底粉碎江青一夥的「幫派體系」，同時要將運動的重點，逐步由組織清理轉至思想及路線批判^{⑤7}。這顯然是在對江青等四人作組織處理後，決定要收縮。可是，截至八月半爲止，絕大多數省市對轉移重點的提示置若罔聞，仍舊強調要擴大清洗^{⑤8}，即連過去自認沒有江青黨羽的內蒙、西藏，也改變了論調，說當地也有「四人幫」的幫派體系，並採取整肅行動^{⑤9}。只發現三個省、一個大軍區附和收縮論，其

註⑤4 葉劍英在「十一大」修改黨章的報告——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新華社北平電。

註⑤5 華國鋒在「十一大」的「政治報告」——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新華社北平電。

註⑤6 葉劍英老邁，汪東興担任「十一大」祕書長，可能主持中共中央日常黨務工作，且缺乏行政經驗，二人出任「國務院總理」的可能性甚小。

註⑤7 同註⑦。

註⑤8 「三中全會」後安徽、甘肅、四川、湖南、福建、浙江、雲南、新疆等省均有此種報導。

註⑤9 一九七七年八月十六日內蒙廣播、一九七七年八月十八日西藏日報社論：「粉碎『四人幫』在我區的資產階級幫派體系」。

中四川還是一面講要轉移重點，一面又講要「開展一次新的、猛烈的進攻」^④，顯得言不由衷。到了「十一大」，連華國鋒的提法也有了改變。他雖然指示要加強路線與思想批判，但將之說成「長期的更爲艱巨的任務」；而組織清查則是整個運動的「重要組成部份」，並限期在年內或稍長時間完成。不過，華依然強調縮小打擊面，即連「四人幫」的骨幹份子，只要願意悔改，不再繼續反抗，也可不加追究^⑤。

在完成奪權以後，華國鋒計劃聚合「四人幫」以外的文革派，組成以他爲中心的新派系，作爲保權的主要依靠力量。惟整鬥「四人幫」的運動一發難收，在很多省市逐漸演變成對文革派的全面清算，整肅面不斷擴大；就連在北平，若干已躋身黨政領導階層、受到華國鋒器重的文革派第二流人物，如「國務院副總理」孫健、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姚連蔚和李素文，也難逃劫運^⑥。華重組新文革派的計劃遭遇強大阻力，難以推展。他現在提出轉移重點及對骨幹份子也應從寬發落，是想利用「四人幫」一案已經定讞的機會，再作努力，使文革派的殘餘力量能以保全。

值得注意的事，鄧小平對處理這一問題却另有主張。他主張對「曾經自覺的跟『四人幫』走，……將自己算成是『四人幫』一份子的，要毫不留情把他揭出來加以制裁」；又舉發「四人幫」在各省市有個代號叫「死黨」的潛伏組織，主張「不管花多大力量，一定要把這個毒瘤除掉」^⑦。這同華國鋒的主張背道而馳。鄧小平兩度被罷官，對江青一夥乃至整個文革派有刻骨仇恨，現在顯然想要報復。對地方反文革勢力，這是個新的刺激因素^⑧，有可能激起更大規模對文革派的全面清算。文革派在各省市的潛勢力仍然很強大，江青集團的黨羽更一直在採用從消極抵制到企圖發動武裝暴亂的各種方法，作「拚命抵抗」^⑨；而這一派在台上的重要頭目，包括華國鋒在內，也不會讓鄧小平及地方反文革勢力，把他們的羽翼剪除淨盡，自陷於絕境。因之，設若再加重壓力，必招致更激烈的反抗。尤有進者，華國鋒在「十一大」的政治報告，指控地方「四人幫」餘黨，「支持和侵略」民間「那些仇恨社會主義」的人，從事「階級報復」。這等於承認，黨內和社會上的反對力量已在配合或聯合行動。假如日益嚴酷的清算鬥爭逼得地方文革派無路可走，這些靠造反起家的闖將，有可能進一步同社會上的反共力量結合起來，運用羣衆暴力負隅頑抗。他們不可能成功，

註④ 湖北、四川、貴州三省及武漢軍區，引文見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一日「四川日報」社論：「緊跟華××奪取新勝利」。

註⑤ 同註④

註⑥ 孫健等三人在十月政變後轉趨活躍，願受華國鋒賞識。惟孫自六月十日後即未在公開場合露面，姚連蔚、李素文二人則自五月二十三日後停止活動，三人中李

原爲十屆中委，姚、孫爲十屆候補中委，十一屆皆未入選。

註⑦ 同註④

註⑧ 據不完全统计，黑龍江、安徽、浙江、內蒙、甘肅、西藏六省區，已將在批鄧反右運動中另搞一套，列爲當地「四人幫」的一大罪狀，加以批鬥。

註⑨ 「徹底粉碎『四人幫』的幫派體系」——一九七七年八月六日北平人民日報。

但地方權力衝突的加劇，導致社會動亂的加劇，進而使恢復工農業生產與政治秩序的努力蒙受不利影響。

中共對地方情勢這一可能趨向有足夠估計。葉劍英將文化革命的價值，提升到與奪得政權等量齊觀^{④⑥}，其用意之一，就是警告地方反文革勢力，也是警告鄧小平一幫人，要按照這個價值標準，正確對待文革及江青集團以外的文革派，不要再搞反攻倒算。而華國鋒於指示從寬處理「四人幫」骨幹份子的同時，又指示「狠狠打擊」社會上的階級敵人^{④⑦}，則是想從另一方面，防止地方情勢續趨惡化。不過，地方的尾大不掉久已存在，對華、葉的號令未必聽從，加以在這個問題上，北平還有個由鄧小平任指揮的司令部，號令並不統一。估量這些措施的實際效用，實難得出樂觀的結論。

其次，三中全会和「十一大」認定與江青集團的鬥爭，是中共歷史上第十一次重大鬥爭，其現實意義，在肯定對劉少奇、林彪、彭德懷三個集團的整肅是對的，不容翻案。事實上，華國鋒當權以後，除了對林彪集團大小頭目的出口，依然關得很緊，對被打成劉少奇一黨的次要角色，則放寬毛澤東生前所定「解放」的尺度，有不少已經被放了出來，委以與被整前相等或稍低的職務；八月一日，彭德懷集團的第二號人物黃克誠，也獲得平反，在北平建軍節集會上公開露面。對劉、彭兩集團，中共新當權派所要防堵的是彭真、彭德懷等主要人物。這些人在黨政軍各方面有很大潛勢力，他們如果復出，不僅對華國鋒，就連對鄧小平也足以構成威脅。在這個問題上，華、鄧利害一致，可以在一個指揮部共同發號施令。惟當擁鄧、反鄧兩派為鄧小平復出纏鬥不休之際，各式各樣的翻案風就已經颳了起來^{④⑧}，鄧小平的官復原職，對這些翻案風也是個新的刺激因素；而次要角色放多了，也有可能形成一股或幾股力量，衝擊被堵塞的出口，釀成圍堵與反圍堵的鬥爭。萬一出口被突破，彭真、彭德懷等人能夠捲土重來，權力衝突將由兩派對峙，擴展為多角鬥爭，而益難收拾。

此外，中共已決定盡快處理過去審查幹部遺留的問題，為大多數受「誣蔑」的幹部平反，重新分配工作^{④⑨}，這主要指的地方幹部。這批數量不小的地方幹部被「解放」以後，如果真能像北平所希望的「正確對待」文化革命^⑤，將是一個安定因素；但如果起而報仇雪恨，則將增強地方反文革勢力，對地方權力傾軋與社會動亂如火上加油，其助燃作用也不宜低估。

再來看軍隊問題。鄧小平在軍中並無深厚影響力，惟復出後將致力爭取軍隊，厚積實力地位，華國鋒不能不注意防範。不過，在這一方面，目前使華深感困擾的還不是鄧小平。華上台以後，對爭取軍隊也十分重視，並已獲得一些軍方有力人士如葉劍英、

註④⑥ 同註①②

註④⑦ 同註①②

註④⑧ 台北有關方面所獲吳德一九七七年四月間在中共北平市委會議上的講話。

註④⑨ 同註①②

註⑤ 同前註

陳錫聯等的支持；還依靠這種支持，採取各個擊破方式，整掉四個軍事頭目^⑤。但他失掉的遠比得到的為多。

一九七六年十月，葉劍英指出軍隊的三項問題，是軍中有人包庇「四人幫」的餘黨、有人想利用「四人幫」事件重建山頭、林彪集團企圖死灰復燃^⑥。這三項問題迄今為止的變化是：(一)由軍中有人包庇「四人幫」的餘黨，變至承認軍隊也有「四人幫」的幫派體系，並決定發動整軍，將之「徹底砸爛」^⑦；再變至承認整軍遭遇阻難，任務艱巨，但「決不半途而廢」^⑧。(二)由軍中有人想重建被削平的山頭，變至承認軍隊已存在山頭，並三令五申，要克服軍隊的山頭主義、宗派主義^⑨。(三)由林彪的殘餘勢力想死灰復燃，變至將林彪集團同「四人幫」拉在一起，指為一丘之貉^⑩；再變至將它們同列為打擊目標，在整軍中一併加以解決^⑪。葉劍英還親自指示說：「決不能讓『四人幫』、林彪那樣的大小野心家，篡奪我軍各級領導權」^⑫。在短短十個月期間，共軍的三項問題，已變得越來越嚴重。

深一層分析，這三項問題主要出在地方，這些問題的日益嚴重，顯示華國鋒一夥當權派與地方實力派關係的日益惡化，也顯示地方共軍中這三種反對力量的日益囂張。這迫使華國鋒不得不改變對處理軍隊問題的謹慎態度^⑬，發動全面整軍。華雖有葉劍英等人的火力支持，並懂得運用軟硬兼施的手法，一面整頓，一面安撫，甚至把朱德、賀龍、陳毅等人的靈牌也捧了出來，用恭維這些死人，來博取他們在各軍系舊屬的好感。但是，全面整軍連毛澤東生前都不敢冒險一試，華國鋒這樣做無異於玩火，假使火勢控制不住，就會反轉來燒到他身上。鄧小平的動向也應加注意。就立場推測，鄧似乎不應在以江青集團、林彪集團為主要打擊目標的整軍問題上為難華國鋒，惟以與立場相背離的策略對付反對者，是共產黨人慣用的鬥爭手段，很難推斷鄧不會趁火打劫。

撇開權力鬥爭，再就鄧小平復出後對內政策的變化問題，作簡要分析。在三中全會前夕及會議進行期間，北平報刊發表三篇文章，替由鄧授意草擬、被批判「三株大毒草」的三個文件，即「論總綱」、「中國科學院匯報提綱」、「關於加速工業發展的若干

註⑤ 被整肅為空軍司令員馬寧、南京軍區司令員丁盛、蘭州軍區第一政委洗恒漢、安徽省軍區第一政委宋佩璋，洗、宋二人有軍籍，故列入計算。

註⑥ 台北有關方面所獲葉劍英一九六六年十月的講話。

註⑦ 共軍總政治部：「關於傳達貫徹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精神的通知」——一九七七年五月三十一日新華社北平電。

註⑧ 「深入揭批『四人幫』搞好十個『應該不應該』的教育」——一九七七年七月十八日北平解放軍報社論。

註⑨ 「全面落实抓綱治國的戰略決策」——一九七七年四月十日北平人民日報社論。

註⑩ 向羣：「敵我關係的根本顛倒」——一九七七年三月十四日北平人民日報。

註⑪ 「加速國防現代化」——一九七七年八月一日兩報一刊聯合社論

註⑫ 同註⑩

註⑬ 參閱註⑤

問題」(簡稱「二十條」)翻案^①。說草擬這三個文件是遵奉毛澤東的指示，毛從未說它是毒草，把這些「香花」打成毒草，是「四人幫」別有用心，背着毛幹的壞事，為「論總綱」作翻案的文章，也承認「以三項指示為綱」的提法，犯了「原則性的錯誤」，其內容也有「一些缺點和錯誤」^②；另一文章則說「匯報提綱」是未定稿，且正遵照毛的意見從事修改^③；而為「二十條」翻案的文章，更說被「四人幫當作箭靶子的三個資料都不是正式稿子，其中一個還是「錯漏百出」的手抄本^④。再將這三篇辯護文同原作一比較^⑤，立論也有差異。這已經非常清楚，翻案的人對三項文件也非完全同意，他們進行辯護，是為替鄧小平復出鋪路，而不是接受鄧小平路線，他們的政策主張，同鄧小平也有分歧。換言之，三項文件及所作翻案文章，不足反映中共對內政策的趨向，要解答這一問題，還要向其他方面找尋線索。

華國鋒在「十一大」的政治報告，強調毛澤東的不斷革命論，已為中共指明在整個社會主義時期革命與建設的「根本道路」^⑥。他接着闡釋不斷革命論，完全肯定毛這一極左理論的主要論點，即在社會主義社會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始終存在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新老資產階級在社會上還是個「很大的力量」。但對毛的另一主要論點，即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的論點，作了重要修改。他仍然肯定黨內有「走資派」，惟認為只要最高權力掌握在堅持馬列主義路線的領導核心手中，走資派就只佔極少數，不可能在黨內形成資產階級^⑦。這雖仍將黨內鬥爭長期化，但主要敵人已由黨內走資派，改換為社會上的資產階級；鬥爭的主戰場，也隨之由黨內轉變為黨外。其次，他又修改毛將鬥爭絕對化、全面化的思想，強調無論是黨內或社會上的階級鬥爭，都要講求策略，注意聯合多數、打擊少數，不能四方出擊、樹敵過眾。他據此提出的撥亂返治八大任務，基本上仍是遵循毛澤東路線，僅作若干技術性改變。除了繼續批鬥「四人幫」及整黨、整軍，在政治方面，堅持強化暴力統治，鎮壓異己，同時改變毛的僵化政策，運用彈性策略，廣泛爭取與軍，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⑧；經濟方面，堅持依循社會主義方向，建設四個現代化，打擊資本主義勢力，遏

註① 這篇文章是：「要知松高潔待到雪化時——推翻『四人幫』對『匯報提綱』的誣陷」——一九七七年七月一日北平人民日報；「打着反復辟的旗號反復辟」——批判『四人幫』對『論總綱』的批判」——同年七月七日北平人民日報；「一場篡黨奪權的反革命醜劇——評『四人幫』對『廿條』的『批判』」——同年七月十六日北平人民日報。

註② 見註⑥為「論總綱」翻案一文。

註③ 見註⑥為「匯報提綱」翻案一文。

註④ 見註⑥為「廿條」翻案一文。

註⑤ 三個文件原件見喬辛：「四人幫事件探索」之附錄——香港七十年代一九七七年四月初版。

註⑥ 已列入「十一大」修改後的中共新黨章。

註⑦ 參閱「偉大的里程碑」——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北平兩報一刊聯合社論。

註⑧ 參閱華國鋒：「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學習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毛澤東著作出版委員會關於「毛選」五卷的介紹——一九七七年四月十四日北平人民日報。

阻資本主義傾向，同時將過去專重以政治方法解決經濟問題，改為除重視政治方法，也重視經濟方法⁶⁸；文教方面，堅持以文化教育作為改造全民思想的工具，同時將過去的先紅後專，改變為紅專並重，並重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惟說明鳴放不能違反社會主義以及黨的領導，允許「放毒草」，是爲了便於剷除⁶⁹。

華國鋒這種改變，有不少地方是採納鄧小平的意見，但與「鄧小平路線」還有一段距離。這段距離只是方法上的差別，與思想和路線無關。因而不難協調。不過，政策爭執久已成爲權力鬥爭的工具，鄧與毛、江之間的策略性爭端，可以被雙方誇大爲思想及路線的根本分歧，把對方說成是「極右派」。現在爲了爭權奪利，鄧也有可能用同樣手法，來打擊華國鋒。鄧復出後的兩次講話⁷⁰，都沒有提到不斷革命論，這裏面大有文章。

華國鋒宣佈鬧了十二個年頭的文化革命，現在已經結束。惟就上情觀察，文革的許多後遺症，非僅沒有醫治好，反而愈來愈重，空言結束文革，並不意味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北平新當權派希望化亂爲治，但「形勢比人強」，鄧小平的復出，算不上是安定的因素；展望未來，還會有新的變化。

註⁶⁸ 參閱註⁶⁷華國鋒文及余秋里在「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上的報告」（一九七七年五月五日北平人民日報），華國鋒、葉劍英在該會議上的講話（同年五月十日北平人民日報）

註⁶⁹ 參閱⁶⁷及「培養德智體育都得到發展的一代新人」（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北平人民日報），「黨的知識份子政策不容踐踏」（同年二月二十二日北平人民日報），「毛選五卷關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部份論述」（同年五月三日北平中央電台）

註⁷⁰ 同註⁶⁹及鄧小平在「十一大」的閉幕詞——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四日新華社北平電